



漫談「玩牌」

尹慶耀

這是一篇信馬由騮式的漫談文章，說不上什麼結構與層次。所談的是當今國際政治上一個流行的術語——「玩牌」。在談到本題之前，先談幾項觀念。

有人把外交解釋成是預測對方動向而決定自己行動的一種「競技理論」^①。玩牌是競技的一種，自古以來，外交上縱橫捭闔、以敵制敵的先例不少。可是，現今的「三角」牌局中，誰都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是在玩牌，美國如此，蘇聯如此，至於中共呢？一九八一年四月四日「美聯社」發自北平的報導透露，中共一名高級官員說，中共絕對不玩「俄國牌」，也不站在蘇聯一邊^②。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法新社」發自北平的報導說，中共的「北京週報」發表評論，再度抨擊美國為霸權主義，但它表示將不打「蘇聯牌」^③。這些話真的可信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把外交解釋成「競技」，無疑是着重在「術」的方面，是指依靠謀略與權術之運用，來處理一國的對外交涉，它應該靈活多變，而不應固執一端。不過，這樣的解釋，應該指外交技巧而言，不應包括外交政策在內，因為外交政策是有延續性（Continuity）的，游移多變，會使自己在國際間失去信任。這讓我們想起一些不一定很正確的名言。

首先，是往昔英國外相帕麥爾斯頓（Henry J. T. Palmerston 1784-1865）曾經說：「英國沒有永恆的盟友，……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是永恆的和永久的，而追求這些利益乃是我們的責任」^④。日本的外相椎名悅三郎也說過：「外交是國

註① 「中共在世界上的分量」，〔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本篇為該新聞社駐北平的稻田特派員所作。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第一版。

註③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第一版。

註④ 怕麥爾斯頓於一八三〇—三四年、一八三五一—四一年任英國外相，一八五—五八年、一八五九—六五年任首相。一八四八年在國會答詢時作此名言。見

益的表現，無所謂王道或霸道」^⑤。這些話就值得商榷。

當然，我們承認國際間只重利害，不重道義，乃是事實。可是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公然違反道義，從長遠觀點看，那是否合乎國益，就大有問題。一次慕尼黑協定（Munich Pact）是英國外交史上永難洗除的污點。在越南不光榮的撤退，也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沉重的包袱。大唱「談判時代」的尼克森，在親自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也曾表示要信守協防臺灣的承諾（Commitment）。其左近則聲稱，如果嘗試放棄防衛臺灣責任以求問題的解決，美國將蒙受政治的、道義的損害^⑥。事實上，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中共被接納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被迫退出後，一位南越的高級官吏對「日本經濟新聞」駐西貢的豐倉特派員描繪了當時東南亞各國領導者的心態。他以譏諷的口吻說：「與其說他們是放棄了臺灣，不如說是將要拋棄把眼光注視着中共的美國」^⑦。該報以為當時美國在表面上「擁護」臺灣，同時和北平勾勾搭搭，那是兩面外交的手法。又美國爲了國內情況而單方面課徵輸入稅，並斷然削減對外經濟援助。面對着美國這種冷峻的態度，所謂「美國已經不可靠」的空氣，頓時瀰漫了全世界^⑧。由此看來，道義還是不能棄若敝屣的。

「玩牌」一詞不始於尼克森和季辛吉時期，但多元（Multipolarity）的均衡外交却從他們那時候開始，季辛吉對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均勢外交研究有素，當然會受他的影響。不過，梅氏的均勢外交中沒有共黨政權存在，而季氏的均勢外交主要對象就是共黨政權，基本上是有差別的。

美國的均勢外交，主要的是要在既有秩序中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共黨政權是革命政權，那「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可以達到」目的^⑨。爲此，它必須打破均勢、改變現狀。即使它暫時追求均勢，也不會長久維持不變，這是共黨的意識形態（Ideology）使然，是共黨的本性。在尼克森訪問過大陸並與周恩來發表過「上海公報」之後，周於一九七四年三月廿四日在招待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Julius K. Nyerere）的晚宴上，公開保證繼續支持「世界上所有被壓迫國家與被壓迫人民的

註^⑤ 「中共在世界上的分量」^①，〔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八日）。本篇未註明作者。

註^⑥ 「中共在世界上的分量」^②，〔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本篇乃該新聞社駐華盛頓的神末特派員所作。

註^⑦ 「中共在世界上的分量」^③，〔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本篇未註明作者。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一版），二八五頁。

「革命鬪爭」，這是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訪平以來首次重彈此調。同年四月一日周恩來在招待高棉共黨頭目桑凡的宴會上，又公然諷刺尼克森「建立一代和平」的外交目標，他說：「革命人民並不全然相信所謂持久和平或一代和平這類說法，帝國主義存在一天，革命與戰爭就不可避免」^⑩。

提起意識形態，或許會招來訕笑，因為目前國際間只講現實利害而忽視意識形態。但這就自由世界言或許有幾分正確，共黨政權可並不如是。你以為蘇聯會放棄世界革命還是中共會丟掉它那四個「堅持」？有一項假定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認定共黨政權一與西方接近，就表示它已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而改採實用主義。為什麼不可以設想共黨政權一方面作法上「現實」一些，另方面堅持它的意識形態呢？美國聯中共制蘇聯不曾放棄自己的自由民主的基本信仰，有什麼理由認為中共聯美制蘇就該放棄共產主義呢？

中共和蘇聯同樣信奉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有相同的意識形態，但彼此走向分裂。中共和美國在意識形態上敵對，但彼此又拉起手來。這確是使人迷惑的事。本來，照馬克思的理想，全世界最終會成為一個大「公社」（Commune），但在此之前，由於彼此發展階段不同，可以分別建設各自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此，各個國家既是一個政權實體，它就有其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也可稱為個體利益；共黨是有國際性的，共黨集團自成陣營（現稱社會主義陣營），有其國際利益，可稱為集體利益。集體利益是共同的，個體利益則顯然不能完全一致。中共與蘇聯的衝突是由於個體利益的矛盾，並不妨害其相同的意識形態以及最終的共同利益，這或許可稱為共黨型的權力鬭爭（Power struggle）。試看中蘇兩個共黨政權宣布的對外政策以及其對外行動，常常有不謀而合、無聲的配合之處，就是因為它們在共黨本質上，有其「平行」的「戰略利益」之故。

這當然不是說北平和莫斯科的衝突只是演雙簧，它們是真的，而且在鬭爭哲學薰陶之下，它們的鬭爭是很激烈的。正是爲此，中共才去拉攏美國和第二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組成「反霸統一戰線」。中共和那些國家，只是「統戰」層面的結合。「統戰」是統一戰線（United front）的簡稱，那是共黨爲了孤立打倒主要的、當前的敵人，聯合包括次要的、未來的敵人在內的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作戰的一時的組織。共黨沒有永久的朋友，可有永久的敵人，自由制度的國家與政府，就永遠是它的敵人。既然沒法一次打倒那麼多敵人，就只好運用統戰手法，分階段各個擊破。

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就是國際統戰的理論。喬冠華任中共「外交部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最後歸納起來就是當前的國際上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形勢是：『一個世界，兩家人，三分天下，四個矛盾，五種力量』」^⑪。

註^⑩ 馬克任：「美毛關係的新動向」，臺北：〔聯合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卅日）第三版。

註^⑪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喬冠華在天津中共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所作「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四一〇頁。

前三句是毛澤東所講，時間在「三個世界」理論提出之前。「一個世界」是中共赤化的目標。「兩家人」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以為講革命就只有兩家，沒有第三家。「三分天下」就是把世界劃分為第一世界——美、蘇；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是反超、反霸的主力軍；第二世界——介乎二者之間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反超、反霸鬭爭中可以聯合的力量。

四個矛盾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矛盾。這是從列寧、史達林時代就講起的，一九六九年四月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重述，並把民族矛盾擺在最前。

五種力量是尼克森所講的五個權力中心——美、蘇、日、西歐、中共。

顯然，中共要在五種力量中玩牌，利用矛盾，一面搞統戰，一面攬革命，而它認為「當前世界主要的傾向是革命」^⑫。最後出自毛澤東之口的這句話，雖然已不常講，但那不表示此一目標的放棄。

II

自由國家與共黨政權相較，前者不適於玩牌，而後者可能成爲玩牌的高手。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從思想方法上言，自由世界應用的傳統性邏輯或形式邏輯（Formal Logic）是根據同一性原理，其公式：是—是、否—否；共黨世界應用的辯證邏輯（Dialectical Logic）是矛盾性原理，其公式：是一否、否—是。自由世界的「和平」概念是戰爭狀態的終結；共黨世界的「和平」概念是戰爭的另一形態，戰爭與和平互相轉化。因此，自由世界的「和平」是終點站，共黨世界的「和平」是中繼站。自由世界的盟友之間，要彼此忍讓遷就；共黨在「統一戰線」之內「又聯合、又鬭爭」，以爭取量變質變。

就談外交罷，牛津字典的定義是：「外交乃應用談判以處理國際關係」。自由世界的「外交」幾與「談判」同義，而談判的目的在妥協，妥協就須彼此讓步，或是用外交詞令、模棱兩可地應付過眼前。共黨世界的「外交」呢？—遜尼（Stefan Possony）博士說：「在世界革命的兵工廠中，外交是一個主要的攻擊武器」^⑬。已故蘇聯外長維辛斯基（A. Y. Vyshinsky）說：「外交是一種事務性的、和平的、與軍事不同的作戰工作」^⑭。鮑斯卡倫（Anthony T. Bouscaren）說：「美國的外交家，當其與

註^⑫ 以上請與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周恩來對中共黨內所作國際形勢報告（摘要）中所講的五句話對照參閱。同註^⑮所揭書，三四九頁。

註^⑯ 納勃·斯特勞茨胡普（Robert Strausz-Hupe）史梯芳·卜遜尼合著《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麥克勞希爾（McGraw-Hill）書局（一九五〇年）版。

註^⑰ 轉自中共《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〇〇七七頁。

蘇聯商討的時候，習於依據一種假定，以爲外交是調處爭持和以協調精神調整國家間衝突的一種手段；而對於蘇聯呢，外交只是代替或支持革命攻擊的工具罷了」^⑯。黑魯曉夫在解釋共黨參加國際會議的意義時說：「戰爭並非不可避免，雖然帝國主義強國並未失去爭奪的胃口，但我們想從這次會議上有所收穫。我們共產黨人雖然不能說服對方，但我們必須迫使他們接受我們的立場」^⑰。兩相比較，自由世界在觀念上就吃了虧。

從尼克森以降的美國總統和若干外交方面的領導人物，在與中共接近的同時，仍屢次申言不背棄中華民國。尼克森政府也曾爲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盡了力，可是中共仍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被接納進入曾經正式決議譴責它爲「侵略者」的聯合國。廿六日晚，伊朗「大使館」在「北京飯店」舉行宴會，周恩來得意洋洋舉起酒杯滿場飛，他坦白表示：「（聯合國）如此的表決結果（接納中共入會），是出乎意料之外的」^⑱。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來同英國作家兼記者馬克斯韋爾（Neville G. Maxwell）談話時，也說：「聯合國表決的結果，我們就沒有料到來得這麼快，恐怕美國也沒有想到它的『兩個中國』的方案會失敗得這麼慘。結果呢，這門就打開了。人們說：尼克森可以到中國，爲什麼我們不能去」^⑲？

其時，美國和中共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只發表了尼克森將於翌年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尼克森尙未成行。倒是季辛吉於那次聯合國大會投票之前，再度訪問中共，不是有心也是無意中爲中共拉了票。當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認爲尼克森是「表面憤怒，內心微笑」^⑳。爲了表示他對中華民國的真誠，把羅吉斯國務卿喚來斥責一番，另方面派季辛吉到北平去增進感情^㉑。那也是玩牌罷！可是，周恩來對馬克斯韋爾說：尼克森自己前來叩門，說他願意到「北京」來談談，於是我們就請他來談。現在會談還沒有開始，我們已經進了聯合國，這是勝利，但我們不會出賣任何一項原則^㉒。看來，周恩來並不感激美國的作爲，只是誇耀中共得到便宜而不失「原則」。美國是不能如此吹噓的。

周恩來對馬克斯韋爾說：「要維持它的那些『老朋友』是美國政策的核心」^㉓。周恩來當時也把美國當局的話信以爲真。的

註^⑯ 鮑斯卡倫著劉光炎譯《共產帝國主義》（臺北：世界書局，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一五頁。

註^⑰ 參見《紐約時報》（一九五九年三月七日）第二頁。

註^⑱ 「中共在世界上的分量」^㉔。

註^⑲ 轉自「中共在世界上的分量」^㉔。

註[㉐] 同註^㉔文章。

註^㉑ 周恩來同馬克斯韋爾談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英國《星期五泰晤士報》曾予揭載，中共翻譯時會有刪節，《中共機密文件彙編》所載係中共譯文。本節所引出自日文《世界週報》（一九七二年）新年特大號。

註^㉒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三四一頁。

確，尼克森在往訪中國大陸之前，曾在他提交國會長達二三六頁的外交政策報告中，重申美國將繼續支持中華民國。他承認他的北平之行，會使中華民國的「老友」感到痛苦。不過，他強調美國的立場是明顯的，那就是：對於中華民國，我們將維持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外交關係和我們的協防義務^㉑。卡特總統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廿六日與美國編輯人晤談，當談到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時，他當場指出，美國同時也要履行對臺灣「神聖的義務」（Sacred obligation），事後白宮發表的談話全文把這幾個字改為「長久以來的承諾」（Long standing commitment）^㉒。可是，當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時，却完全接受了中共的要求，使美國對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而毫無回報！美國豈不「背棄」了自己的諾言，完全放棄了自已的原則立場？美國前衆議院撥款委員會援外小組召集人派斯曼在訪華期間，曾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廿日談稱：美國立國以來，不曾有過毀約的情事^㉓。美國與中共建交，創本身毀約惡例而失信於國際，這場牌局美國顯然是居於下風了。

四

共黨政權不會受輿論影響，因為它沒有輿論。自由國家沒有這種方便，即使在選舉之前民意測驗十分之九都不準確，但平時一而再、再而三的測驗當局獲得人民支持率的升降，當局者每每不能把它置諸度外。

蘇聯的蘇維埃，中共的「人代會」，都不是真正的國會，而自由國家國會裏分明存在着一個或者是複數的反對黨。共黨政權領導者沒有任期，即使形式上有，但共黨控制一切，其政策仍然有連續性，其短程計劃圖謀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以求自保（Self-Preservation），中程計劃追求國家權力（National Power）以加重自己在國際間所能扮演的角色（Role），長程計劃在實現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彼此並不衝突，勿寧說是脈絡一貫、循序漸進。自由世界如以美國為例，新總統上任，需要一年時間熟悉白宮事務。第二年須在中期選舉中耗費一些心血、精力與時間。第三年要為下一任大選連任佈局，第四年忙於大選難有作爲。如能當選連任，理論上可以放手有所作爲，實際各方面的限制仍多。而且，即使你自己已不能三選，但你的作爲也不能不為下屆本黨的候選人預先鋪路而不願盡失人心。

一位總統在內政上失利，會想在外交上有某種突破以挽救個人聲望。在國際活動中，失之東隅，又想收之桑榆。我們相信，中共就在這種情形下，撿到不少便宜。尼克森倡言「談判代替對抗」（negotiation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他却不知早

註㉑ 〔聯合報〕（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第一版。

註㉒ 〔聯合報〕（一九七七年八月卅一日）第一版。

註㉓ 〔聯合報〕（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一日）第一版。

在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就說過談判是「針鋒相對」的鬭爭[◎]。

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的三大支柱，是所謂「實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夥伴關係」（Partnership）、「談判代替對抗」。如果能貫徹始終，倒也未可厚非。可是，「低盪」（detente）的空氣一經瀰漫，增加國防預算就會遇到困難，爲了選票，減少國防經費要比減少社會福利基金的影響小些。雷根總統承認蘇聯在核武器方面，佔有明確的優勢（A Definite Margin of Superiority），那並非尼克森與蘇聯簽署第一階段限武協定（SALT I）當時原有的情況，它確與十年低盪有關，而美國的「實力地位」就因而削弱。「夥伴關係」更促進國際政治多元化，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對，不過美國再要求盟邦一致行動就困難些。

提到談判，自由世界除了妥協之外，就是使用外交詞令，在文字力求含混不清、模棱兩可，把問題往後拖，成是留給後任者去解決。而共黨也會使用此種方法使對方入彀，再求使他逐步深陷、不能自拔。尼克森和周恩來的「上海公報」就是如此的各說各話，而中共則把「公報」上的「認知」（acknowledge）翻譯成「承認」（recognize），把文件上的詞句，照自己的意見，曉曉不休的爭論。不僅在文字上如此，在雙方建交前夕，中共使卡特政府直覺地認爲中共已放棄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又當卡特時代制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核准對中華民國軍售時，中共並未有過激反應。而今日雷根政府執行臺灣關係法，繼續對華軍售，却遭到中共如此激烈的反對，甚至以「降低關係」爲要挾，把「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頭銜，再度加在美國頭上，企圖迫使美國修改或廢止臺灣關係法，訂定期限終止對中華民國的軍售。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美國和中共發表的「聯合公報」，在文字上確是可圈可點的外交詞令，可是，「美國政府茲聲明其並不謀求執行一對臺銷售武器之長期政策，對臺灣武器銷售在質或量上均不會超過美『中』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後近年來（美對臺灣）所提供之水準，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臺灣之武器銷售，經由一段時間而趨於一最終解決」[◎]。這又是避免在本屆政府任內弄成關係倒退，而以不明確的文字妥協，但求暫時渡難關的作法。中共今後必然逐次施壓、步步進逼，不達希望就絮絮叨叨一直吵鬧下去。萬一遇到一個立場不如雷根堅定的總統，未始不能實現其陰謀！就像與中共建交的不是尼克森而是卡特一樣。

尼克森與中共接近，最初也相當謹慎。他曾對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說：他希望美國和中共間的門戶開放，就像日本當時和中共所達到的那種程度。當時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國務次卿葛林（Marshall Green）聲稱：「美國與中共建交是將來的事」[◎]。因

註[◎]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原爲解釋重慶談判者，後經標題爲「關於重慶談判」，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一五五一—六四頁。

註[◎] 依據《聯合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二版之譯文。

過度反蘇而有親中共之嫌的美國參議員賈克遜（Henry M. Jackson），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至六日訪問中國大陸，歸國後在記者會（七月八日）上被問及中共對他所提的美國和中共迅即建交主張有何反應？他的答覆是：「在速度方面，他們（指周、鄧等人）並無反應（They didn't respond in terms of pace）」^{②9}。美國和中共一九七八年宣布、一九七九年建交，也許是尼克森當初所不曾想到的。如果周恩來不死，他又會說出乎意料之外，也會再度洋洋得意地說，中共沒有放棄任何原則就達到了（建交）目的。

美國人口裏講「耐心」，實際上最「性急」。回憶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之後，中共首先斥責蘇聯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③0}，跟着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③1}。把蘇聯推向帝國主義一邊，彼此就正面對立。就理論上講，「歷史時期」的轉變就意味着政策轉換的時機來臨。同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談話，同意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議，聲言中共一貫主張要美國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③2}，那就象徵着中共要改變它對外鬭爭的戰略部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毛澤東對美國作家兼記者史諾（Edgar Snow）談話，表示歡迎尼克森往訪中國大陸。這篇談話曾以「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為題，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那也正是中共發動「乒乓外交」之時，這分明顯示中共有意拉攏美國。可是美國過於性急，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以現任總統身分往訪一個沒有外交關係的政權——中共，而中共許久都沒有高級官員回訪，這就抬高了中共的身價而貶低了美國的地位。

一九七八年中共和越南關係惡化，形成南北腹背受敵（蘇越）之勢。其時，蘇聯對中共的包圍圈正在縮緊。同年八月，華國鋒往訪羅、南，歸途訪問伊朗^{③3}。同時，中共將其對外活動重心，由第三世界轉移至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中的美國（現又逐漸轉回第三世界）。同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和日本的「和約」成立，北平在「第三國條款」方面讓了步。在與美國建交問題上，鄧小平等於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十天內有三種說法，其中態度有明顯的後退跡象^{③4}。可是，卡特政府不察，在建交問題上履行了中共的三條件，在自己的主張方面，却不曾獲得中共的保證。

^{註29} 〔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周傑：「賈克遜的觀點與美國對華政策」（上），該報（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七日）第二版。

^{註30} 參見《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三日）。

^{註31}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E. Hoxha）及總理謝胡（M. Shehu）電文。

^{註32}

^{註33}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社論），以「包圍與反包圍」為題，稱華國鋒羅、南、伊朗之行，為打擊蘇聯在巴爾幹及亞洲的擴張活動，指蘇聯擬從東、南、西三面包圍中共，却不料蘇聯自己已逐步受到包圍。

^{註34}

請參閱「悄悄地傳話，公開的答覆」，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社論。

目前，中共內政方面，經濟犯罪，三信危機，文革餘黨勢力猶在，鄧派路線遭受挫折。據一九八二年六月間的一項報導說，中共高級經濟學家及蘇聯問題專家們，在一項加緊研究蘇聯體制的工作會議中，絕大多數支持蘇聯那種中央計劃的經濟模式⁽³⁵⁾。這顯示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已受到重大威脅。因此，中共最近對美的強硬姿態，恐怕是原因衆多。諸如：(一)對大陸反對與美過度接近者加以安撫；(二)既已與美建交，現今對美強橫，對蘇緩和，求取比較均衡之勢，便於「玩牌」；(三)中共外交重心重回第三世界，聲言其本身「永遠屬於第三世界」，爲便於「反帝」、「反霸」宣傳，須對美表示強硬；(四)中華民國在臺成就，給予中共嚴重威脅。中共近年來對中華民國發動統戰攻勢未獲實效，而大陸與海外同胞愈加嚮往自由祖國，故中共亟欲加害中華民國，冀能熄滅反共人民心中希望之火；(五)雷根政府反共立場堅定，與中華民國關係良好。中共如能使雷根政府受挫，將來中共對美國政府更可進一步敲詐。

在九月初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鄧小平亟須在內政外交上有所表現，以保證他在大會中權力鬭爭的勝利和路線執行的暢達。這樣說，該着急的是中共而不是美國。中共不會先把它和美國的關係降低，再去投靠蘇聯，那樣它是會吃虧的，北平領導人畢竟也不是白癡啊！

五

中共不玩蘇聯牌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和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有一次會晤，那是中共所不願見的。同月六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內閣)一封賀電(七日爲十月革命紀念日)，建議雙方「首先要按照中蘇兩國總理一九六九年九月達成的諒解，簽訂包括有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兩項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議，並進而談判解決全部邊界問題」⁽³⁶⁾。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蘇聯總理柯錫金與周恩來在北平機場會晤，決定於同年十月二十日在北平舉行副外長級邊界談判。談判開始之前，中共於十月七日，爲邊界談判發表聲明，對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等等，只說是中共的「建議」⁽³⁷⁾而不是「諒解」，至於簽訂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協定，原是蘇聯的主張而屢遭中共拒絕。因此，上述賀電一經傳出，就引起中蘇共

註⁽³⁵⁾ ^ 美聯社／北平電，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註⁽³⁶⁾ 該賀電以中、英文稿分發各國駐平使館及新聞記者，未在中共報刊公開發表。

註⁽³⁷⁾ 原聲明刊於《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

行將「和解」的一陣緊張猜測，中共要給美國一些刺激，對美蘇接近加以牽制。那就是玩牌。

過去，中共和蘇聯之間存在着黨與黨的對立（Party-to-Party Conflict）和國與國的對立（State-to-State Conflict）。前者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或原則鬭爭，後者是國家利害的衝突。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堅持原則鬭爭要長期持續，但不應因此而妨礙國家關係正常化，那是說黨的鬭爭重於「國」的鬭爭。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就在同一年，中共開始把蘇聯的內政與外交分別對待，認為蘇聯內部仍是社會主義，為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就沒有了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共指摘蘇聯對外實行擴張政策、霸權主義，但那已是次要之爭。放棄雙邊的原則鬭爭，進行多邊的反霸（Anti-negemony）鬭爭，拉起旁人一起反蘇，也是玩牌。

蘇聯是否玩牌呢？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的演說，實際是對準三個對象：其一是印度，目的在防美印接近；其二是日本，企圖擴大美日因貿易和軍費問題導致的裂痕；其三是中共，在華盛頓和北平之間進行挑撥。這都是玩牌。

布里茲涅夫說，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對蘇「中」關係問題的原則性立場，在蘇共廿五大和廿六大的決議中，已經明確闡明過，現在我想再補充下面幾點：「其一、當然，我們過去和現在一直公開批評中國領導的政策，尤其是對外政策的許多方面，不合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準則。但是我們從來不想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的生活，北京在世界舞臺上，同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勾結，這當然違背社會主義的利益，但是我們從來不否認中國有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其二、我們從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所謂兩個中國論，過去和現在都完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島的主權；其三、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任何領土要求，而且隨時都願意繼續會談現有的爭執問題，以便取得彼此都能接受的見解，我們還願討論加強與中國邊境地區互相信任可能採取的措施的問題；其四、我們清楚記得，蘇聯和人民中國親密友好和同志般的合作，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兩國敵視和疏遠的狀態是一種正常現象，我們願意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使雙方都能接受的、在尊重地方利益、互不干涉內政和互惠的基礎上，改善蘇中關係的措施達成協議，當然不能損害第三國，無論是經濟、科學、文化，還是政治方面都好，只要在任何一個方面，採取具體步驟，已經做好準備的話就可以」³⁸。同年五月廿日蘇共「真理報」刊有亞歷山德洛夫所作「論蘇中關係」一文，對布里茲涅夫談話更加詳盡的予以闡釋。

中共當然瞭解蘇聯是在玩牌，不過它這次的反應也很特別。它以在幹部中傳達的「參考消息」發表了布里茲涅夫講話有關中共部分的全文，再由現已升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錢其琛於三月廿六日發表簡短談話，對布某講話表示中共「注意」（布某講話中有關中共和蘇聯關係的部分）、「拒絕」（布某攻擊中共的部分）和「重視」（蘇聯的具體行動）。同一天，「新華社」對布

^{註38}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五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原文（新聞部分）。

某講話作了評論，也同錢其琛的談話差不多，並且說布某「部分」表明了和中共「改善關係的意願」。

文章寫到此處，恰巧看到一項消息：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對聯合國秘書長裴瑞斯（Javier Perez de Cuellar）說，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點是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聯合愛好和平與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不管這種「霸權主義來自何方」。他說，中共不會依附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中共不會打「美國牌」去對付蘇聯，不會打「蘇聯牌」去對付美國，也決不允許任何人玩「中國牌」^⑨。這些話恐怕是要從反面去理解的。實際上，中共打「蘇聯牌」去騙取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的援助，以增高自己的實力地位。另一方面，又與蘇聯眉來眼去，文化、體育的交流（雙方邊境貿易業已重開）、經濟學家的往來，進而是外交官的互訪。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北平透露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當時正在莫斯科，他將於訪問蘇聯外交部之後，再往華沙訪問波蘭外交部。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卡比察（Mihail Kapitsa）大致每年訪問北平一次，今（一九八二）年是五月十三日抵平，曾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及「蘇聯遠東司」司長于洪亮會談。中共「蘇聯遠東司」司長前年和去年未曾訪問蘇、波，今年是首次，蘇聯、東歐方面有關人士認爲這是中共同蘇波兩國的外交關係，朝着「正常化」的方向發展，這是「值得注目」的事^⑩。

美國想促使中共在波蘭問題上和美國採取一致行動，那是絕無可能的。美國若認爲中共和蘇聯分裂是它促成的，將來可用賄買手段阻止二者復合，那都是自信過剩，不符合事實。今後中共在第三世界反對不管「來自何方」的霸權主義，美國也無可奈何。因爲這些都是意識形態所決定，是共黨政權的本質使然。

六

我們中華民國可不可以玩一玩牌呢？這得慎重考慮。筆者固然不反對外交上該具有彈性，可是，三十幾年來我們歷盡艱險、備受挫折，仍能屹立不搖，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得來不易，不能輕易把國家命運當作賭注。

我們屢次說明以共制共是錯誤的途徑，也就不便在那條路上留下自己的腳印。一九七七年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爲卡特撰寫的講話稿中，曾經指責美國人民對於共產主義不正常的恐懼心態（Inordinate Fear of Communism）^⑪。筆者以爲如果把那一句當中的共產主義改成蘇聯字樣，也許會更爲妥切。那麼，在舉世反蘇聲中，我們最好不要把「蘇聯牌」拿在手中，以免真正的絕對孤立。當我們看到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的講話內容時，我們會清楚地瞭解蘇聯的立場，那如何「聯」得

註^⑨ ^新華社／北平八月二十日電，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廿一日）第二版。

註^⑩ ^時事社／北平十六日電，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第一版。

註^⑪ 參見陳裕清：「美國外交策略的分歧」，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第二版。

?如果我們不察而表錯了情，那就不止是貽笑於人，更會爲我們帶來危險的厄運。我們敢斬釘截鐵地說，有計劃摧殘自己的民族文化、迄今仍然堅持馬列主義、歌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中共，絕非自由世界之所謂民族主義者，但毛澤東會以「反俄」的姿態鎮壓內部的反對者並且欺騙大陸同胞，現今鄧小平還以「反霸」的口號，在國際間進行統戰。我們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共在政治上、經濟上無法對我們加以誣騙，我們也不能在民族主義方面授它以造謠的機會。我們要對海內外同胞作號召，要對祖先與後世子孫作交代，那是我們的歷史使命感。從帝俄到蘇俄，侵略中國的野心從未稍戢，我們豈可不加慎重！說得現實一點，一聽說中共要收回香港主權，香港當地就人心惶惶，資金也紛紛外流。如果我們玩「蘇聯牌」，其影響如何，外資會不會撤退……，是不能不多加考慮的。

或許是邱翁說過，必要時不惜與魔鬼握手。可是，我們目前沒有那種「必要」。三十幾年的驚濤駭浪沒有嚇倒我們，我們的成就是足可支持我們的自信心。我們對中共已打贏了第一仗，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努力不懈，命運就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相信，我們應該留在自由陣營，我們也要使旁人相信，中華民國留在自由陣營，對世界、對人類都會有貢獻。

儘管中共在美國有過遊說（Lobby）組織，有某些新聞記者爲它製造有利的輿論^⑫，但是，美國和中共在本質上是永遠對立的，而中共的統戰伎倆也「不能長久欺騙所有的人」，終歸是要失敗的。當中共要和美國決裂時，即使沒有軍售問題，它也會找另一藉口誣過於美國，它該不會勇於自己承擔責任罷！

我們有正當的途徑和方法開拓我們的外交新境界，但自己不玩牌，也希望自由國家及早放棄玩牌！

註^⑫ 參見史丹利·卡諾（Stanley Karnow）：「可憐的美國新聞記者——戴着淡紅色的眼鏡看中國大陸」（譯題），臺北：〔聯合報〕（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三版。該文原載《大西洋月刊》（同年十月號）。

五 次 圍 剝 戰 史 (上 下 冊) 十 六 開 本 兩 巨 冊

工 本 費 新 台 幣 五 百 六 十 元
美 金 十 六 元

郵 資 另 加
國 外： 航 空 美 金 二 十 二 元
平 寄 八 元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中 心 代 售

憑 機 關 學 校 公 囱 證 明 發 售